

贪权之伤

“求无餍足谓之贪”。当权力的追逐没有止境并不择手段时，
就是典型的贪权行为。

万银峰 但晚生◎著

中国方正出版社

贪权之伤

“求无餍足谓之贪”。当权力的追逐没有止境并不择手段时，
就是典型的贪权行为。

万银峰 但晚生◎著

中国方正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贪权之伤/万银峰、但晚生著. —北京: 中国方正出版社, 2014. 11

ISBN 978 - 7 - 5174 - 0141 - 4

I. ①贪… II. ①万… ②但… III. ①反腐倡廉—案例—中国

IV. ①D63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28168 号

贪权之伤

万银峰 但晚生 著

责任编辑: 刘彦彩

责任校对: 张 蓉

出版发行: 中国方正出版社

(北京市西城区广安门南街甲 2 号 邮编: 100053)

发行部: (010) 66560933 门市部: (010) 66562755

编辑部: (010) 59594611 出版部: (010) 59594625

网址: www.lianzheng.com.cn

责编 E-mail: fangzheng1313@126.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0.5

字 数: 130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ISBN 978 - 7 - 5174 - 0141 - 4

定价: 25.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出版部联系)

责任编辑：刘彦彩

封面设计：索美文化

作者简介

万银锋 河南省淅川县人，1972年出生，中央党校硕士研究生毕业。现为河南省社科院办公室副主任，兼党建政治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主要从事反腐倡廉建设研究，单独或合作出版学术专著6部，发表论文100多篇。

但晚生 江西省都昌县人，1965年出生，武汉理工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2001年由部队专业到中共河南省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多次受命参与中共中央纪委、中共河南省纪委一些重要案件的查办工作，多次荣立个人二等功。

目 录

贪权腐败引起的冷思考	(1)
——写在前面的话	
第一章 买官卖官者的“权力市场”	(1)
——黑龙江绥化市委原书记马德贪权腐败案的思考与启示	
一、买官卖官：贪权者赤裸的交易	(1)
二、不惜重金买官为哪般	(5)
三、马德手中的“官帽批发”	(9)
四、根除“官市”滋生的土壤与空间	(12)
第二章 生命攸关不把关	(17)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原局长郑筱萸腐败案的思考	
一、滥用职权：绑在公共权力上的绞索	(17)
二、国家医药监督权肆意滥用	(21)
三、郑筱萸权力背后的“寻租”	(24)
四、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27)
第三章 为权上演跑官的闹剧	(33)
——江苏省徐州市原市长陈耀南跑官被骗的警示与思考	
一、跑官要官：吏治上的恶性毒瘤	(33)
二、“扶正”心切遇到“贵人”	(37)

贪权之伤

三、陈耀南跑官上当的丑行	(40)
四、整饬吏治我们还有多远的路要走	(44)
第四章 一个“权力家族”的破灭	(49)
——安徽省委原副书记、省政协副主席王昭耀腐败案的 思考与启示	
一、权力之网：一种扭曲的官场形态	(49)
二、王昭耀倾心打造的“权力家族”	(53)
三、王氏关系网中衍生的腐败链	(57)
四、由王昭耀腐败案引发的几点思考	(60)
第五章 权力笼罩之下的人生迷途	(65)
——河北省国税局原局长李真腐败案的启示与思考	
一、腐败年轻化：值得警惕的腐败新动向	(65)
二、“河北第一秘”曾经的权力追逐	(69)
三、权力笼罩下的“得志”与“猖狂”	(72)
四、由李真腐败案引发的启示与思考	(76)
第六章 倒在“选票门”下的高官	(81)
——宁夏回族自治区原副主席李堂堂腐败案的思考与启示	
一、拉票贿选：伸向“票箱”的黑手	(81)
二、陕西省原副省长的拉票丑闻	(85)
三、李堂堂拉票背后的权力腐败	(88)
四、净化民主选举环境刻不容缓	(90)
第七章 权力“迷宫”里的腐败	(95)
——江苏省苏州市原副市长姜人杰腐败案的思考与启示	
一、权力“迷宫”：贪权者的弄权招数	(95)

二、一张“领导批示”诡秘运作	(99)
三、姜人杰借“壳”洗钱爆出的新型贿赂	(102)
四、规范权力运作的思考和建议	(105)
第八章 佛门前倒下的巨贪	(110)
——河北省原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丛福奎腐败案的思考 与启示	
一、官员迷信：贪图者演绎的新招术	(110)
二、拜在“女大师”面前的高官	(114)
三、佛门面前丛福奎的敛财之道	(117)
四、坚定理想信念是一个永恒的课题	(121)
第九章 权力之争引发的官场暴力	(126)
——福建省环保局原副局长杨锦生谋官毁人的思考与启示	
一、官场暴力：贪权者的登峰造极	(126)
二、一个权欲熏心的利己主义者	(130)
三、杨锦生导演的残害“一把手”案	(133)
四、对杨锦生谋官毁人的冷思考	(137)
第十章 政法委书记的“屠刀”	(142)
——河南省平顶山市原政法委书记李长河贪权腐败案件的思考 与启示	
一、报复陷害：贪权腐败者的帮凶	(142)
二、李长河手中的绝对权力	(146)
三、政法委书记举起的屠刀	(150)
四、保护公民举报检举权利任重道远	(153)

第一章

买官卖官者的“权力市场”

——黑龙江绥化市委原书记马德贪权腐败案的思考与启示

权力产生之初就与财物有关。在某种意义上，财物是权力产生和权力争夺的根本动力。当金钱成为财物交换的一般等价物后，权力与财物的关系就变成了财物与金钱的关系。这种关系在现代“拜金主义”面前，越来越表现得如影随形、相伴而生，似乎有了权就不愁没钱，因为权力能调动一切资源，何况这个“一般等价物”；有了钱也不愁没钱，因为“有钱能使鬼推磨”，甚至用钱可以换得权力。由于这种庸俗的逻辑存在，现实中最突出的表现是，买官卖官、权钱交易现象屡禁不止，一直为现代国家和政党无法根治的顽症，成为当前反腐倡廉，建立廉洁政治面临的重大课题。

一、买官卖官：贪权者赤裸的交易

权力与金钱的勾结，从国家权力产生以来就没有停止过，几乎不同时期都能找到权钱的影子。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卖官鬻爵屡见不鲜。最为典型的是公开、明码实价买官卖官的“捐官”制度。即，捐官者

贪权之伤

缴纳一定数额的银两后，由朝廷或衙门开具买官证明，买官者手持收据等着赴任。这种“捐制”自秦汉就有，在旧中国一直持续了近两千年，当时的卖官收入的银两，要如数全部上缴国库，虽然其中也不乏有中饱私囊者，但终归属于国家财政收入的组成部分。除公开的“捐官”制度之外，封建社会也存在很多掌握一定权力的官员收受贿赂，而给行贿者任命官职的腐败行为。最典型的就是明代的严嵩，他既以“千辆资财，用以遗贵近”买官得以升迁，终于当上了内阁首辅；又以“官无大小，皆有定价”卖官聚敛钱财。严嵩败落抄其家后，所得净金、金器重3.4万余两，净银、银器重203.9670万两，其他珍宝、字画、房地产不计其数。

买官卖官说到底，是以钱买权或以权卖钱，纯属赤裸裸的权力与金钱交换关系。在这种关系面前，买卖双方都各有所图、各自实现自己的利益。作为买官者，买到职权可以使他获得更多的补偿机会，所以就不惜用重金买官铺路；作为卖官者，交易本身使他直接得到非法金钱利益，所以就不惜拿公权大肆交易。在现代民主社会里，虽然民主制度不断发展，选举已成为官员的主要产生形式，但买官卖官行为并没有从根本上根除，特别在某些后现代国家里还逞愈演愈烈之势，成为任何一个政党和政府都头疼的难题。近代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出现的“政党分肥”，就是最典型的现象：获得政权的政党就等于取得了批发官职的权力，执政党可以根据竞选中的实际贡献，按竞选中赞助分授给竞选出钱者不同的职位。

我国是人民民主制度，与古代社会、西方国家有着质的不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特别在权力授予机制上与古代和西方国家表现出显著不同。为保证吏治清正，把权力授予党和人民信得过的人手里，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惩治和预防吏治腐败从来没有停止或放

松过。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为防止金钱对干部选拔任用冲击，自上而下都在干部选拔任用上设置了防止买官卖官的“藩篱”，并对用人中的不正之风进行了综合治理。2008年，中央纪委、中组部印发了《关于深入整治用人上不正之风进一步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的意见》，明确强调对违规违纪用人问题必须坚决纠正、严肃查处。2010年，中央纪委、中组部、监察部还下发了《关于严厉整治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行贿受贿行为的通知》，整治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行贿受贿行为，也就是俗称的“买官卖官”进行了部署。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党和国家不断采取有力举措，持之以恒地强力整治买官卖官，但由于体制机制还不够健全，监督的力量还相对薄弱等，不可避免地使买官卖官问题大量存在。少数不法之徒铤而走险，玩弄买官卖官新花样，与执政党的选人用人政策博弈。特别是随着用人腐败的不断发展和蔓延，新的“奇迹”不断被创造出来，以致出现了买官、卖官“专业户”式的人物，类似现象还被人们俗称为“带病上岗”、“带病提拔”、“边腐败边提拔”，等等。《学习时报》“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三十年”的文章指出：“改革开放以来，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和巨大的成就。但是，人们困惑不解的是：为什么成就如此巨大，但选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却屡禁不止？有些现象，如买官卖官等过去不太显露的问题现在反而更加突出，甚至在一些地方较为盛行，造成吏治腐败，成为人们深恶痛绝的腐败现象。”

例如，河南省许昌市委组织部原部长王国华，不仅在热点经济领域变着方式谋取不当利益，而且通过干部职务晋升、调整工作、安排就业等方式为他人谋取利益，特别是在干部选拔任用上“卖官”敛财。经最终查明，王国华在担任临颖县副县长、县长，临颖县委书记，许昌市副市长，许昌市委组织部长期间，在职务晋升、工作调整、安排就业等

贪权之伤

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 38 人贿赂人民币 141.4 万元和 2000 美元。2009 年 11 月，因受贿卖官等犯罪行为，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 15 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再如，湖南株洲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龙国华，任株洲县委书记期间就开始了买官卖官，使“花钱向县委书记买官”一度成了当地官场心照不宣的“潜规则”。2007 年 2 月，龙国华即将赴株洲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履新，可他手上还有一批收了钱没兑现的“欠账”。于是他当年 1 月 8 日、17 日主持召开县委常委会议，分两批突击提拔了与自己关系密切的下属和“知己”118 人，其中 39 人涉嫌突击违规提拔。后经查明，龙国华在任期间多次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共计人民币 411.646 万元、美元 1.54 万元。2010 年 4 月 1 日，湖南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判处龙国华无期徒刑。

又如，山西省临汾市翼城县原县委书记武保安，2000 年 4 月至 2004 年 5 月，利用担任临汾市翼城县县长、县委书记的便利，在上任只有短短 8 个月时间，即不断调整干部，并在其中大造舆论、玩弄权术、践踏制度、撩拨人心，大肆卖官索贿。先后为 28 人在职务提升、工作调整、个人进步等方面谋取不正当利益、29 次非法收受对方人民币 88.8 万元，另有 406 万余元、美元 8.7 万余元，不能说明其合法来源。最终法院以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武保安有期徒刑 15 年。

还如，安徽省蚌埠市政协原副主席、五河县县委书记徐社新，除了具有大多数贪官们的“共性”外，还具有自己的个性和“传奇”——在担任五河县县委书记 6 年期间，坚持“收了钱财，给人官帽”的买卖两讫原则，将五河县几乎所有乡镇和县直重要部门的“官帽”卖了个遍，在遭人举报后甚至动用县电视台高调辟谣。在徐社新认定的 74

宗受贿事实中，小到一般干部、大到县人的副主任都没有放过。最终因受贿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案，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 14 年零 3 个月，并处没收个人财产 30 万元。

从这些触目惊心的案例不难看出，买官卖官腐败滋生蔓延并非危言耸听，已成为破坏党和政府肌体健康的一颗毒瘤，成为当前人民群众最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吏治腐败越来越成为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最大、也是最严重的“腐败源头”。当下“一万元挂个号，五万元报个道，十万元买个帽”，“不请不送，降低使用；只请不送，原地不动；会请会送，提拔重用”等顺口溜，虽然不乏偏颇、夸大其词，但现实中确实还有一些活生生的案例给予了充分的印证和展示。被称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买官卖官案”的马德腐败案，就是买官卖官最为典型的案例。

二、不惜重金买官为哪般

马德 1949 年 11 月出生在克东县乾丰镇的一个贫农家庭，贫困的家庭并没有给予他温暖和幸福。父亲和母亲都是老实厚道、本本分分的农民，他的家境用 4 个字就完全概括——“饥寒交迫”。据报道，小时候因为家里穷，马德经常利用放学后的时间捡破烂和废铜烂铁到收购站去卖，或者村前村后拣粪肥，以此换来微薄的学杂费。

这样一位出身贫寒的农家子弟，靠着组织的一步培养和个人努力慢慢成长起来。“文革”时马德在当地公社当通讯员，由于会来事很讨领导喜欢；“文革”后期根正苗红的马德被推荐到上海复旦大学读书，毕业后被分配到省里工作。从 1968 年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1970 年 12 月入党，马德正式进入了仕途，并一路高升。从黑龙江省革委工交办秘书，省经委秘书、副科长，省委政策研究室研究员，海林县副县长、县长、县委副书记、书记，逐步成长为牡丹江市副市长，黑龙江省

贪权之伤

电子工业局副局长，绥化地区行署专员、地委书记、市委书记，无论在什么位置上他都是以年轻有为著称。

1991年2月，“春风得意”的马德，作为牡丹江市副市长的候选人，在换届选举中败走麦城，被差额掉了。3个月后，马德被安排到省电子工业局任副局长。但让很多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一年半后马德果然卷土重来，再度出任牡丹江市副市长。也许从那时起，马德在官场上更加雄心勃勃、志在必得，同时也似乎把贫寒的背景忘记了，组织的培养忘记了。就是这么一个曾自称为“海林人民的儿子”，至今仍让贫穷的海林人民念念不忘的“和蔼可亲的马县长”，随着官职的不断晋升，一步步被权力的欲望、被金钱的欲望冲昏了头脑。

从那时起，他就无时无刻不在关注着“上面”，试图找到自己的“靠山”，以及升官的“梯子”。最终，他的目光盯住了最初对他的印象和看法不好的时任黑龙江省委副书记韩桂芝。根据有关媒体报道，最初作为省委组织部长的韩桂芝对马德的印象非常不好。当时还任黑龙江省委组织部长的韩桂芝，一次对各市地考核干部的人员说，绥化行署专员马德的工作水平和理论水平属于低下的那一种，对他的考核一定要认真谨慎，切不可被表面现象蒙蔽了。她的一番话不知从谁的嘴里传到了马德的耳朵里，无异于晴天的雷霆，立即引起了马德的警觉和慌乱。因为手握“官帽”的组织部长韩桂芝，在他升迁的道路上任何一句话都是“金口玉言”。

究竟是什么原因得罪韩桂芝了？几乎成了马德的一块要命的心病。他思前想后做了很多假设，但一直不得其解。为了在绥化这片土地上出人头地，为了稳固自己的专员官位，他必须一边研究反“炮弹”、反“毒箭”的具体措施，一边认真细致研究韩桂芝的动向。日夜思谋着，用什么办法来抹去韩桂芝心里对自己的阴影。就在马德煞费苦心地煎熬

时，不期而遇的转机来到了。

1998年夏天，松花江发生了历史罕见的特大洪水。全省人民和解放军官兵一起，夜以继日地全力以赴战斗在抗洪抢险的第一战线上。茫茫大水之中，松花江、嫩江沿岸的村屯，已经是汪洋一片，失去家园的农民，齐聚在防洪的大坝上。这天，时任黑龙江省委副书记的韩桂芝陪同省武警总队的一名领导，来到了松花江的防洪大堤上。那时风大浪高、水流湍急、坝堤泥泞、道路难行。韩桂芝一不小心滑倒在地，把她的手骨摔断了。韩桂芝被送到了一家医院及时地进行了处置。为了防止发生意外，经医生建议韩桂芝必须转到技术高超、医术精湛的上海一家大医院去。韩桂芝在其妹妹的陪同和照顾下乘飞机到了上海。

马德是第一时间得到“韩桂芝手臂摔伤转院去了上海”这一消息的，他暗下决心一定要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靠金钱撬开韩桂芝的“门”。于是他立即就与妻子田雅芝商量，准备共同前往上海。为了打动韩桂芝，为了表示自己的衷心 and 孝心，也为了自己的财源不断，他决定选择最吉利的“八”。决定一次性拿出80万元，前往上海去“看望”治疗中的韩桂芝。

为了掩人耳目，马德向周围的同志使了个“障眼法”，声称要去北京和上海开会。第二天便带着妻子田雅芝飞往上海。二人几经周折来到上海某医院，怀着一种矛盾的心理走近了韩桂芝的高干病房。刚欲迈进病房就被陪护韩桂芝的妹妹和护理人员挡在了门外。可手下的地方大员哪有无见之理？韩桂芝毕竟要考虑马德面子。最终经韩桂芝本人同意，马德和田雅芝走进了高干病房。

马德上前与韩桂芝握了握手，然后将田雅芝介绍给了韩桂芝。一阵客套和相互问候，马德将手提包拎出来，放在了韩桂芝的床前，说：“韩书记，听说你有病住院，我和妻子一商量，准备80万元薄礼。这也

贪权之伤

是个吉利的数字，祝韩书记早日恢复健康，早日为黑龙江人民造福！”韩桂芝一看，这一提包里是80万元人民币。虽然这钱很诱人、很动心，但韩桂芝还是要在下属面前端起“架子”，也好让马德看一看她这个省委副书记是不受贿的。随即韩桂芝就对马德说：“你这可使不得，你不是行贿吗？！我收下的话，就是受贿呀！请你把这些钱拿回去吧，我不能收！”

马德一听顿时就傻眼了。马德尴尬地“呵呵”几声又说：“我们俩可不是行贿啊！这笔钱都是我们自己的钱。我看你有病住院，平时也没有什么准备，这可是我们夫妻的一点心意！”这时田雅芝瞧了瞧韩桂芝的妹妹，灵机一动转过身来对韩桂芝说：“我们的钱款今天是不能带回去的，因为要拿回去一路上携带也不方便，一旦被歹徒劫持或者小偷盗走，这损失不就更大了。依我之见这80万元人民币就由韩书记你的妹妹代管吧！”田雅芝的一席话，真把韩桂芝的嘴给“堵”上了，也“封”住了。此时的韩桂芝顺势来了一个“顺水推舟”。韩桂芝的妹妹将这装有80万元人民币的手提包拎起，由田雅芝陪同走出了病房，以“马德”的名字将这笔巨款存在了当地银行里，存折由韩桂芝的妹妹保管起来。

为了进一步加深与韩桂芝的感情，马德与田雅芝在上海待了几天以后，二人又来到了韩桂芝的病房。马德稍坐了一会儿，便提出了将田雅芝留下来照顾韩桂芝的要求，并提出了让田雅芝做韩桂芝的干女儿的想法。经过一番客气和拉扯，田雅芝还是留了下来，与韩桂芝的妹妹陪护了3个月，一直到韩桂芝康复出院。从此以后，马德和韩桂芝的关系得到了实质性的改善。2000年，在韩桂芝的关照下，马德如愿以偿升任了绥化市市委书记。

黑龙江省绥化市本来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地区，可马德及追随者们不

是把一切精力用在为民谋福祉上，而是一个个把目光定在权力和官位上，不仅自己买官，而且还大肆卖官。所以有媒体称马德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买官卖官第一人”，也有媒体称马德案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买官卖官案”。在马德的影响和“栽培”下，绥化市上上下下竟冒出265名大小贪官，仅马德一人索贿受贿金额就达2385万元，并牵扯出韩桂芝、田凤山等省部级领导干部。

三、马德手中的“官帽批发”

贪权与贪财是一对“孪生兄弟”，买官者必定会去挖空心思卖官。如若不然，马德丢失的尊严到哪里找回？那笔买官的巨款哪里去补？因为，在马德看来，没有永久的关系，只有永久的利益，“体内损失”，只有体外补”。如若不然，靠日常的工作收入，何以填充买官的“窟窿”，何以维持日常的生计？马德愣是仗着送出去的80万元现金，仗着与韩桂芝的特殊关系，仗着市委书记的特殊权力，开始了利用权力的疯狂敛财，以至于有媒体称，马德的办公室和家里，几乎成了“顶戴花翎”的批发市场。

马德卖官最为集中的阶段，是2000年绥化地区的“撤地建市”，因为“撤地建市”很多机构需要变革，许多职位需要调整。马德就紧紧抓住这个机会，将原有县级绥化市（现为北林区）的盈利企业、实权单位进行了“拔毛式的上收”，加大权力集中的力度，再进行人事的重新“洗牌”。实际上，在这种“上收”和“洗牌”的背后，马德疯狂地卖官鬻爵。他和妻子采取的主要办法是先设饵、再甩竿、后钓鱼。也就是，将绥化市各部、办、委、局和绥化市各（市）县“一二把手”的位子空缺出来，然后再按兵不动，吊起大家“胃口”，等着鱼来上钩。

明水县是全国著名的贫困县，经几届班子多年的努力，都没有摘掉